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主编



# 嵩山

# 文化文集

周昆叔 著

 文物出版社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主编

# 嵩山

## 文化文集

周昆叔 著



文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嵩山文化文集 / 周昆叔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010-4804-5

I. ①嵩… II. ①周… III. ①嵩山—文化史—文集  
IV. ①K92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2064号

## 嵩山文化文集

---

著 者: 周昆叔

主 编: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责任编辑: 张征雁 徐 旻

责任印制: 张 丽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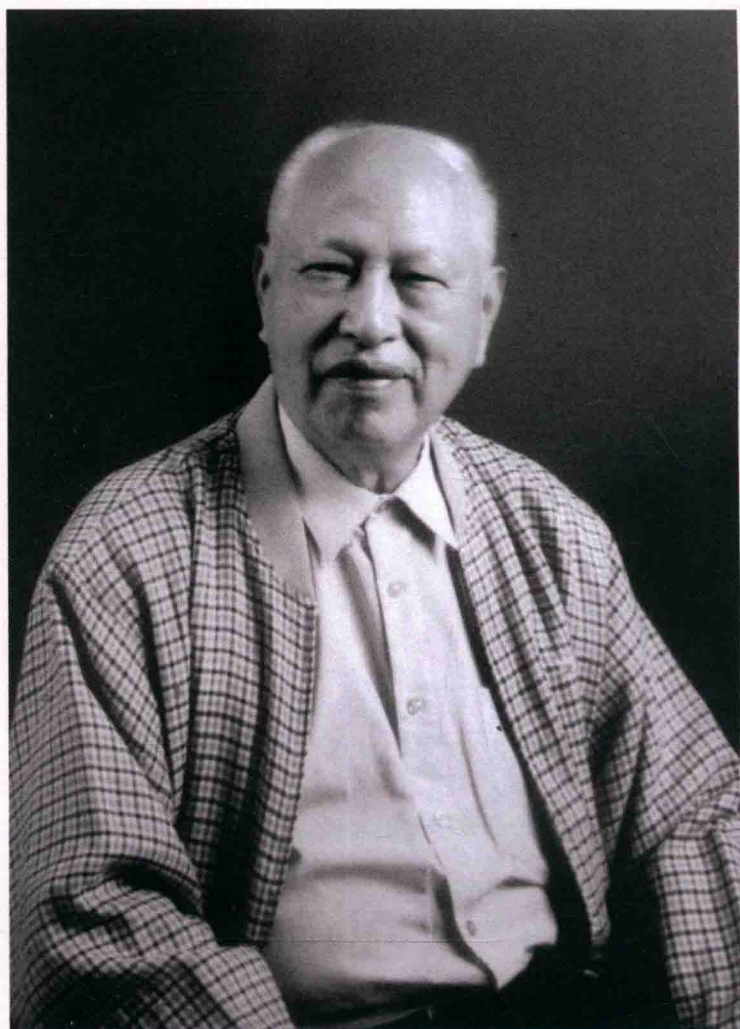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10-4804-5

定 价: 268.00元

---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本书由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资助出版



## 周昆叔 (1934 ~ 2016)

湖南株洲人。第四纪地质学、孢粉学、环境考古学家。195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学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退休。曾任研究员，现兼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第一届科学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2007年初夏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同志(左二)到具茨山视察周昆叔(中)等在此做岩画调查情况。照片中张松林(左一)、宋豫秦(右二)、刘俊杰(右一)。



2004年在河南考察，前排右起：王辉、莫多闻、王向东、赵春青；后排右起：常宗广、汪松枝、高红莉、鲁鹏、张震宇、周昆叔、杨瑞霞、魏国庆、郝利民、谢武成。

## 嵩山文化序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内容沉甸甸的。书中讲的是山——著名的中岳嵩山，看到的是文化——嵩山文化，体悟到的是这文化的核心精神——中：道中庸，行中道，致中和。它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和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中心，有主体，有不同层次的重圈式结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无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历经磨难而从未中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人们著书立说，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何以中国”。本书作者周昆叔先生有感于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番思考。他是中国环境考古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他不知疲倦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首先研究了北京地区的古环境，继而深入研究了陕西的周原和河南洛阳地区的全新世黄土，看出黄土演变与文化发展阶段有密切的耦合关系。后来又长时期地考察嵩山及其周围地区，认识到作为中国中心地区的嵩山乃是维系整个中华文化的擎天柱，从而提出了嵩山文化圈的概念。

作者回顾了自己艰难跋涉的漫长历程，注意到中国人选择生存环境有鲜明的特点，就是依山傍水。既有资源优势，又有安全保障，是文化得以稳步发展的基本条件。不像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主要是濒临大河，即所谓大河文明。虽有高度发展，仍然经不起严重的冲击而早早地陨落了。这个分析是十分精到的。他认为嵩山文化之所以崇高，应是山、水、土、生、气、位六大生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再加上有区位优势，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下之中，有利于掌控全局。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一位学者，当然要力求攀登学术高峰，但不能忘记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综观周先生的学术生涯，处处体现着深深的爱国情怀，对辉煌的中华文明无限崇敬。这使他不畏艰难险阻，坚韧不拔，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不愧为当今学者的楷模。

是为序。

严文明

稿成于2016年1月25日

# 自序

## 回眸·认知·心迹

### 一、回眸

我是从事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怎么搞起嵩山文化研究呢？谈谈原委。

作为 46 亿年地球演变史最新章节的第四纪不过 200~300 万年，但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那就是出现了人类。所以第四纪研究关注的是人类诞生与演化，此与该期古环境变化密不可分，所以古环境研究在第四纪地质学中十分重要。第四纪古环境的恢复要靠许多手段，其中孢粉分析是首选。

从 1956 年开始，我就采用孢粉分析来研究第四纪古环境，为此工作了 30 年。为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发展主要做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立了我国首个第四纪孢粉分析实验室。第二，首先开展了我国古、今沼泽调查及其孢粉分析，为我国全新世地层划分做了奠基性研究。第三，率先以古植被论证了华北古气候旋回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第四，首先开展了我国考古孢粉学研究。第五，对我国西藏、新疆、内蒙、香港等边陲地区首先开展第四纪孢粉分析，另外，还对大同火山群分期等进行了新的研究。

1987 年后，考虑社会与科学的发展，也是参加北京市平谷县上宅遗址研究的需要，我提出环境考古研究方向（周昆叔，《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中的《中国环境考古的最初档案》，264~266 页）。

1987-1989 年间，我把环境考古从上宅扩至平谷盆地，再扩至整个北京平原。发现战国前的人们只依二级台地或二级阶地而居，直到秦汉人们才下到一级阶地和泛滥平原，其动力是 3000 年来干旱气候对一级阶地的塑造，才有了人们靠河流生活的场所。气候塑造地貌，地貌影响人生，环境对人类影响的图景生动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周昆叔，《北京环境考古》，《第四纪研究》1989 年 1 期）。

环境考古一定要与考古学密切结合，我认定必须把视角推到古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我到中原地区首要的工作是要从空间与时间上理顺全新世黄土地层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于是 1988~1990 年，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等单位合作花了三年时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奔跑，行程万余千米。对那里全新世黄土从模糊到逐渐清楚，其地质演变与文化层变化似乎存在一定关系。直到1989年我们考察到陕西关中扶风县北山前的周原，这个周朝发源的圣地，约两米高的五层全新世黄土铺在厚层淡黄色晚更新世马兰黄土上，二者间由于山前流水侵蚀，造成全新世黄土与马兰黄土绝然区分（地质学称此现象为不整合），又见周原许多周晚期灰坑的开口与全新世中期褐红色古土壤顶部平行。这些让我最终认定黄土高原东南与黄土高原中心区全新世黄土的确不同，并且浮出了以“周原黄土”命名黄土高原东南边沿全新世黄土地层单元名称的想法，于是才有周原黄土之说（周昆叔，《嵩山行》，‘边缘科学 最佳视点’一文中的‘中原结果’，233~237页，文物出版社，2010。周昆叔，《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5年2期）。周原黄土命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突破了同时代的黄土只有一个地层名词惯例，同时代质地不同的黄土是可以分区的，所以同时代黄土可以有不同地层名词。其次完善了全新世地层概念，不仅只认地质地层，还认其间的文化层，且看到它们间的耦合关系，这就完善了全新世地层学，也推动了地质地层学与考古层位学的结合。三是建立了黄土高原东南沿环境考古的时空序列，致使在区域上可以进行地质地层与文化地层对比，因此，黄土高原东南沿环境考古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甚至可以此来判别和新发现考古学文化层。

## 满江红·中原情怀<sup>①</sup>

惊回首，绵绵六十<sup>②</sup>。新石器、考古孢粉，半坡初试。八十  
述怀恩与谢，万千里路寻与觅。莫等闲，快马自扬鞭，心头急。

临潼会<sup>③</sup>，播撒种；皆欢喜，好青年。驱长车中原，函谷关越。  
壮志环境考古，笑看文明探源热。待从头、检视半世纪，不可歇。

<sup>①</sup> 2012年6月5日应陕西考古研究院邀做《自然与人文——以中文化为例》学术报告后吟诵。

<sup>②</sup> 长安即西安，自1952年入读西北大学生物系，时届六十年。期间因考察黄土、环境考古等多次往返西安，时过境迁，感慨良多。

<sup>③</sup> 临潼会，指1990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发起在临潼召开我国首届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

1993至1998年间，我除了把环境考古与国家建设——小浪底水库、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相联系，体现出环境考古的实用价值外，着重把环境考古从区域调查，也就是面的调查转向点的剖析。基于此，我全程参与了澠池班村遗址综合研究；还花了五年时间，与洛阳文物工作队密切合作，完成了洛阳关林开发区皂角树遗址研究，研究成果见《洛阳皂角树》发掘报告。在该报告的发行座谈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先生谈到，如果说过去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结合是接触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融合了。

2000年参加中美学者合作研究颍河上游的古文化。我们从禹州盆地沿颍河直到嵩山南麓与箕山北麓颍河发源段的考古学文化调查，看到考古学文化遗址之多、之全、之重要，令我大开眼界。又见到嵩山腹地水系密如蛛网，还见到颍河上游各支流黄土台地发育，古代先民山水相依，嵩山，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随后对嵩山地区古文化、古环境与全国的对比研究后，于2002年在济南市举行的全国第三次环境考古大会主旨报告《十五年来的中国环境考古》中首次提出了嵩山文化圈的理念（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02年以后我更加关注嵩山文化的调查研究，如对双洎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调查。期间发生了两件要事，一是2006年3月应《文明》杂志社之邀，在该刊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嵩山特刊上刊载了拙作《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嵩山文化圈》一文（该文首载于《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11日，7版），当年4月又应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之邀在郑州市作了同题报告，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还特将报告消息刊登在《郑州宣传信息》（第39期，2006年4月17日）上。此外，郑州市还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大力宣传嵩山文化圈的理念，从而使嵩山文化圈从学术走向社会。不久，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同志会见了，他指出：“嵩山文化研究很重要，当前首要的是加强组织工作，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同时要大力宣传‘嵩山文化圈’，做到家喻户晓。他强调：我们若不重视嵩山文化研究就是失职。”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谈话让我为之震动，不时萦绕脑际，叮嘱自己不辱使命（周昆叔，《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序《嵩山峻极文昌远 中华文明日新月异》，科学出版社，2009）。第二件要事是郑州市把嵩山文化研究列入郑州市重大研究项目，由我主持。我们对嵩山地区古文化与古环境做了进一步研究，包括嵩山与周边古文化比较研究，黄河的前身河水流向与改道调查，大河村遗址古环境研究和具茨山岩画调查等。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我长住登封市进行调查研究，并出版了《嵩山行》一书（文物出版社，2010）。

## 二、认 知

在我近 30 年的环境考古生涯中，一步步走向嵩山，对嵩山研究历时 15 年，占去我 60 年科学研究生涯中的四分之一，占去我环境考古生涯的一半。嵩山给了我许多启迪，归结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认知。

### 1. 中国是山水文化国家

人们一想到古文化必然会想到河流，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巴比伦（伊拉克）、印度文明皆如此，中国则不同，古遗址空间分布显著特点是依山傍水，或谓“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这是为何？原因是我国为多山国家，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被山占据，大河多半是在山间绕来绕去，故我国大多数遗址是发现在大河一二级支流、二三级支流或三四级支流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我前面谈到的上宅遗址就坐落在潮白河二级支流将军沟的河岸黄土台地上，它濒靠燕山山脉的凤凰山。半坡遗址坐落在黄河三级支流浐河与灞河间的二级阶地上，濒靠秦岭山脉的骊山。仰韶遗址坐落在黄河四级支流饮牛河与西沟的黄土岗地上，濒靠崤山山系的韶山。王城岗遗址坐落在淮河一级支流颍河与二级支流五渡河黄土岗地上，濒靠嵩山的王岭尖。磁山遗址坐落在古黄河一级支流洺河旁的黄土台地上，濒靠太行山的洪山。这种依山水而居的遗址许多是重要遗址。母亲河黄河上中下游抚育了多民族儿女，但黄河文化的代表却是黄河中游地区，这里濒黄河主干道的重要遗址比比皆是，其分布多在黄河中游各支流，这些地区都是山水之交，且这里的山都是黄河支流的源泉。所以讲母亲河黄河时绝不要忘记黄河源头和她两岸的山起的重要作用。依山水对华夏文化的孕育很重要：一是山水为形成我国文化多种多样的原因之一；二是山水培养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禀性，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证明；三是山提供了水等重要资源；四是山成为防瘟疫，防敌犯的重要屏障。因此，依山水生存不仅是我国先民选择生存场所的显著特点，而且是一种优势。

何以只能称“山水文化”，而不能称“山河文化”，这主要是先民少傍干流河生活；次之水包括河，而河却不能涵盖水，因为水除河外，尚含溪、泉、湖与河海，先民多傍支流生活，也傍溪、泉、湖、河海生活，故只能叫山水文化，而不能叫山河文化。

在某些地区，山与其他生态因素组合成文明形成和文化发达的优势区，如嵩山地区，那里的生态因素最佳组合成为嵩山先进文明的根基。在嵩山及其周边有许多著名古文化遗址，如同散落的珍宝，以嵩山文化圈命名，使嵩

山文化形成中嵩山的文化成因作用得以彰显。在嵩山文化圈下，我们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名之“三水文化”，此说源于嵩山是河、济、淮水源之一；名之“孵化器”和“发动机”，此说源于嵩山是华夏之源；这不仅丰富了嵩山文化圈，也解释了嵩山文化圈。嵩山文化圈是山水文化的典型，所以，嵩山山水孕育出华夏核心文化。嵩山文化圈命名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从故纸堆中捡来的，而是建立在我国一个世纪的考古学研究、近30年的环境考古和多年的嵩山文化研究基础之上的。

自嵩山文化圈命名以来，我们对嵩山文化内容有新发现，对其生态特点作出更进一步阐释，融嵩山神情于一体，歌之，颂之；把嵩山历史与现今结合，察之，用之；察嵩山山水与文化，明之，信之；以嵩山天地之中嬗变中文化，理之，道之。

嵩山文化圈的重要考古发现也源源传出，如许昌人遗址，老奶奶庙遗址，李家沟遗址等。这些年嵩山文化圈不断有考古成果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嵩山东支具茨山东端发现大量岩画。我认为具茨山岩画多为史前人类思想意识的记载，可视作中原古文化研究中除文献、考古外的第三依据。

上述这些深入研究和重要发现不仅证明嵩山文化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说明嵩山文化圈与华夏文化渊源甚密。若追溯我国的历史与文化为什么脱离不了嵩山地区就了然了。有人可以承认中原文化，却不能承认嵩山文化圈。歧义源于对我国先民选择生存场所特点认识不够清楚，囿于其他三个古文明国家为大河文化，这种认识束缚了我们的思维，以至一谈古文化就想到河，殊不知我国是山水文化。所以，只有树立山水文化观念，方能促使认识的统一。

我们真的要感激上天赐予我们嵩山地区这块创始华夏文化的福土，否则我国古文化还会有中原策源地吗？

“皇天后土，中岳唯彰”。（周昆叔，《嵩山颂》，《嵩山行》，文物出版社，2010）

以山命名文化圈有文化和环境的要求，所以我国能以山命名文化圈是很少的。除嵩山文化圈较典型外，其他黄河下游有泰山（泰沂）文化圈；长江中游有大洪山文化圈（刘辉，《试论大洪山文化圈》，《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

重山也是重水，因为山是水之源，故山水一体，不可分割。

山水相依，人依山水，资源丰富，民生富足，悠悠山水，山水文化，历久弥新。

## 2. 中原文化中心论之游移，其主要根源是文化生态缺位。

我们常说树有根，水有源。还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何以如此，这

是物竞天择决定的。我们要生活下去，必生产，生产必适应当地气候、水土环境，这就深深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行为表现为文化，故各地才有文化异同，有先进，有后进，现代如此，古代亦然。这些再平常不过的道理，在某些时候和特定的情况下却容易被遗忘。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2000年前司马迁认定的中原中心论，到2000年后，我们考古学搞了一个世纪，何以中原中心论还是游移的呢？我认为不是中原古文化比周边差了，以至造成中原中心论游移，而是忽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叫文化生态缺位造成的。

要讨论这个问题还得先从文明起源时诞生嵩山文明的生态环境着手。

我们讲嵩山文明是山、水、土、生、气、位六大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这六环境因素。

**山（古陆）：**嵩山是嵩箕地块，为30多亿年的独立山体，地史悠久，地层完整，构造典型，可谓地学全书。山体及周边约4000平方千米。嵩山是昆仑山东延的东端，“苍茫昆仑，逶迤河江。山原之交，嵩山名扬。”（周昆叔，《嵩山颂》，《嵩山行》，文物出版社，2010）。嵩山与昆仑一线，成我国山脉的中脉，昆仑山、秦岭、嵩山如伏于中华之中的一条龙，嵩山为龙首，定昆仑，瞰平原。这条龙状的中脉分我南北，辟我河（黄河）江（长江），其功之伟，难有其二。

嵩山山文与人文有两大特点：

首先，嵩山山腹低丘区是文明之珠。嵩山主要分为两部分，北有嵩山中山，南有箕山高丘，这是嵩山的山区。嵩山、箕山二者间有海拔300-400米高的近100平方千米的低丘，这是嵩山山腹的低丘区。这一低丘区是嵩山聚水、聚土、聚人、聚文，成为华夏之源的聚宝盆。与其他四岳为尖峰比，嵩山腹中低丘区优势尽显。嵩山中凹地形促嵩山文化奥焉！

嵩山南北各有一坳陷盆地，水土丰沃，是两颗文明之珠。嵩山北有洛阳盆地，这里是造就河洛文化的宝地，方能成为“三代之居”。嵩山南有禹州盆地，这里是仰韶、龙山、二里头文化的重地。

嵩山山腹低丘区与其南北盆地为嵩山三颗“早期国家文明之珠”，这是嵩山山文与人文的显著特点之一。

其次，嵩山东支与华北冲积平原间为早期华夏文明形成区。嵩山向东有具茨山和云蒙山两支，这一由嵩山中山、高丘、低丘、剥蚀堆积平原到华北冲积平原特殊地貌，在这山原之交数千平方千米边缘环境带为早期中国的形成区，这是嵩山山文与人文又一显著特点。

**水（三水）：**嵩山为河（嵩山西北）、济（嵩山东北）、淮（嵩山东南）水源之一，三大独立入海之大河，相聚嵩山，相联而成“三水文化”。

**土（黄土）：**嵩山属黄土高原东迤，以“瑞土”黄土为名的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故里于斯，大禹的基业也在嵩山地区，人杰地灵。黄土台地利于农耕。食物相对充裕的嵩山地区，利于文化发展。

**生（生物）：**东西南北植物汇于嵩山，嵩山成为东亚植物基因宝库。在少林寺方丈室旁有两株硕大藤本植物缠绕在侧柏树上，一为常绿阔叶，一为常绿针叶，相得益彰。人们十分好奇，何知那藤本植物本为南国湿热植物，名扶芳藤（*Euonymus fortune*），像扶芳藤这种南方植物繁于嵩山不是个例（周昆叔，《嵩山行》，文物出版社，2010。叶永忠、吴顺卿主编《嵩山植物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嵩山植物区系以温带为主，占植物总数的70%，其中热带、亚热带植物有41科，热带属有140属，占本区总属数的25%，所以嵩山植被有明显的过渡特点。嵩山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过我国南方树种的炭屑，如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

**气（气候）：**我国以农业立国，不误农时，那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故历来重视节气研究，分二十四节气。“早在公元前6000~公元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期，便有历法，且更有使用物候指时的记载”（李永匡、王熹，《中国节令史》，（台北）文津出版社，5页，1995年）。“古代的天文学家在观察了华中、华北地区的每一个阶段内所特有的气象、物候之后，才定出各阶段的节气名称”（文献同前注，16页）。登封告成镇的周公测景（影）台，说明嵩山是我国古代节气测定处。上述文献与古天文台都证明嵩山、中原与我国二十四节气关系密切。嵩山、中原节气典型，雨热同季，景观多样，致使中原干旱黄土台地宜旱作，种植粟、黍、小麦、大豆；在较低洼处多水湿地宜种植水稻，故中原几千年前有五谷生产和六畜饲养。

**位（区位）：**中原地处北纬33°~35°之间，嵩山正值北纬34°，光照适中，水热匹配。在文明兴起时，亚热带北移至北纬37°~35°（周昆叔，张广如，曹兵武，《中原古文化与环境》，《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那时嵩山处在亚热带北沿，水热环境优于今天。亚热带北沿气候更有利万物的繁荣，助五谷农业和六畜饲养兴起。嵩山东北十字形通道，成交通枢纽，便人流、物流，文发、政通。从上述可知，嵩山地区地理属中纬度，气候适宜，又为交通枢纽，控制四方作用显著，有助于天地之中意识形成。

审视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中华文明以中原为中心态势形成，及至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间中华文明奠定时，中原以外的文化沉寂，唯嵩山地

区一枝独秀，此乃嵩山地区六大水土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优势使然。这让我们意识到在我国文明形成过程之中，嵩山、中原文化先进是仰赖这里水土优势的结果，域外的水土不如嵩山、中原，也就不可能出现能与嵩山、中原相匹配的文化。另则，也提示中原文化中心游移的主因是文化生态缺位，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认识不到位。反思中促使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环境考古意识，深入展开环境与文化关系研究，以促进对中原文化中心论的理解。

文化是民族的魂，是民族的根，若中原中心论游移，那我们中华民族魂不稳，根不牢，恐怕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 3. 天地之中嬗变中文化

“天地之中”如何嬗变为“中文化”有一个认识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对“天地之中”认识是朦胧的。这始于2009年5月我长住“嵩山寄楼”。面对嵩山这本大书如何解读，思虑再三，要化繁为简，争取言简意赅，于是写下一首118字的《嵩山颂》，以总结我对嵩山的看法，其中我第一次用到“天地之中”。接着我琢磨嵩山神韵到底是什么，定稿为“天地之中，万山之祖，三水之联，五岳之宗。”这是我第二次提到“天地之中”，而且把“天地之中”列为嵩山神韵之首。尽管如此，嵩山何以为“天地之中”还是朦胧的。

第二阶段，我对“天地之中”认识可称之为深入阶段。这始于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天地之中”被世界认可，登封人民一片欢腾。欢腾之余，人们问何以叫“天地之中”？这时登封市委宣传部邀我为全市科级以上干部讲解“天地之中”，给我出了个难题，也提供了我思考“天地之中”的契机。我以《天地之中——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为题作了报告，报告分位置之中、古天文之中、生态之中、人文之中、政治之中五部分，并归结“天地之中”理念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为使大家有个直观印象，画了张“天地之中树状图”。上述五方面为树根，“天地之中”为树干，“中”文化等作为树冠。使“天地之中”概念具体化，而且着重指出“天地之中”是我们文化认同的“基础”，甚至在“天地之中树状图”中还点出了“中”文化。通过向登封市干部讲解“天地之中”让我对其认识深化了，并初步提出“中文化”理念。这可以说是对“天地之中”认识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深入阶段了，然而未详解“天地之中”何以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

第三阶段，我对“天地之中”认识进入理解阶段。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达几年。此段始于2011年5月我决定离开“嵩山寄楼”返回北京，向王文超书记告别，

并谈到近期一直在想“天地之中”应是我们民族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现在觉得就是“中”。这个“中”就是我们从“天地之中”体会到做人，做事要“中度”，也是“中国”、“中华”、“中原”、“中州”、“中庸”、“中和”、“中道”等重要人文名词都冠“中”的原因。因此，我概而称之为“中文化”的想法更加坚定了。继后才有《大道为中——试释中国传统的“中”文化》和《再谈“中”文化》论文的发表。

2013年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举行以“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为主题的学术年会，我在会上作了《凝聚的嵩山》报告。报告中，我谈到：严格地说天地之中并非指天文意义上的“天地之中”，而是指传统文化的中，指嵩山地区为天下最适合人类生存、文化创造、建国、立都的地方。周公旦受命周武王为营建东都洛邑找根据，才有周公求地中于嵩山这一重要史实，这既是周营东都之需，也是对传统文化“天地之中”的发展与肯定，自此，嵩山天地之中的地位得以明确。《周礼·大司徒》：“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古时天文知识受限，日影求地中有局限性，3000年前先人能如此认真实属难得，令人钦佩！可贵的是对嵩山天地之中气候环境之明示。“天地之所合也”指嵩山天琢地合，“四时之所交也”指嵩山四季分明，“风雨之所会也”指嵩山风调雨顺，“阴阳之所和也”是对前述嵩山气候环境的总结，嵩山是阴阳、正负、矛盾和合之处，故百物阜安，四方来汇，嵩山是百物适生之地，成建国、立都之首选。上述《周礼·大司徒》引文的精髓是道破了“天地之中”的实质，那就是嵩山一带为环境适宜的地方，也道出了周公选择嵩山求地中的环境、文化与区位缘由。适者，不冷不热，不干不湿，不偏不倚，中也。我们先辈经千百年体验嵩山地区是适生、建国、立都之所，谓之“天地之中”，并意识到中的重要，而这个“中”符合事物运动受控于中的规律，所以把传统文化的“天地之中”嬗变为“中文化”，既是对“天地之中”本意的体悟，也是对人们心目中早已认识“中”重要性的表达、肯定与升华。这就让我对“天地之中”的认识开始进入理解的第三阶段了。这一阶段是个漫长的过程，直至今今与未来。

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中文化”是个“长期”研究过程。这反映了对“中文化”重要性和艰巨性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中文化”研究的一个战略思考，继后才有《“中文化”论纲》一书的编写计划和执行。

在一次《“中文化”论纲》讨论会上，我谈到，由“天地之中”转化为中文化说明“中文化”是唯物史观的。话音刚落，宋豫秦教授接着说：“好！”之所以好，我想有三重意思：一，“中文化”的提出把传统文化上的“天地



之中”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二，由“天地之中”转化为“中文化”使“天人合一”思想更深化和更赋哲理。三，由“天地之中”转化为“中文化”，说明“中文化”是土生土长的。

关于“中文化”将在《“中文化”论纲》中讨论，我这里只想说：“中文化”是几千年来“允执其中”、“允执厥中”、中庸、中道、尚中等“中”思想的概括。“中文化”是在中国天地之中传统文化基础上升华为具哲理的中华核心人文文化。

“中文化”是讲物质运动和思想意识受控于中的学问，其哲学表达是大道为中。

万物唯精一，道心执厥中。

中者聚也，力量汇聚；正也，力量集中；发也，力量发挥。以中原为例，聚为四方来会，正为逐鹿中原，发为姓氏之源。

中是相对的，世界处在趋中、离中的运动中。趋中则存则发，离中则陨则废。

中文化具有普世性。中为行为之准，故做人要“本中”。中为处事之章，故做事要“中度”。

天地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思想宝库。天地之中在中文化理念下，在大道为中哲理中发扬光大。

### 三、心迹

时光荏苒，瞬时我已八十有余，所历人事繁芜，兹述心迹三则。

#### 1. 热爱我国古文化

我虽是地质工作者，同时也是古文化爱好者，因此，20世纪70年代我已是中国考古学会的会员，我既为发展我国考古学努力，也得益于我国考古学。

我国考古学诸多成就中，让我尤为关注的是严文明教授的力作《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38~50页），他把中国古文化比作重瓣花，一语破的，我称之为重瓣花理论（周昆叔，《孝文化的科学化》，《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3日，4版）。

重瓣花本来就是理论，只是作者谦虚，我有点越俎代庖了。为什么要称之为理论呢？原因有三。

一是重瓣花科学性强。重瓣花是对在中国特有地理环境下形成既多样又统一文化的高度概括。华夏文明是有中心的，有边缘的，它反映事物归中的、向中的客观规律，因此，它是合理的，可持续的。华夏文明重瓣花是典型的